

两届政治局常委 亲人遭迫害内幕



作者：林辉

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给人类和中国带来了什么？身居高位的中共中央近两届政治局常委中，不少人都切身的体验，他们自身或至亲之人也曾遭受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本篇讲述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王岐山、朱熔基、李克强、俞正声本人或其父辈们锥心的经历。

习仲勋蒙冤16载 与习近平被审查

1962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人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成为毛泽东“揪出”的又一重大“反党集团”。

“习仲勋反党集团”后来被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由此株连了曾在西北工作过的各类官员多达6万人，连死去的刘志丹也未能幸免，被打成“叛徒”。

文革爆发后，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并屡次被批斗。1968年，习仲勋被接回北京卫戍区“监护”。

林彪死后，中共政治环境略有宽松，习仲勋夫人齐心探视习仲勋的请求被批准。当一家人久别重逢时，习仲勋看到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这样的问话，“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975年5月，习仲勋被解除“监护”。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先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人大副委员长等。

无疑，习仲勋的命运也决定着其家人的命运。习仲勋被打倒时，习近平才9岁，他开始时时处处受到歧视。15岁时，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1969年1月，未满16岁的习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

插队，一去就是近7年，受了不少的罪。其后，随着父亲被“平反”，习近平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胡锦涛之父冤死

胡锦涛的父亲叫胡静之，经营一家祖上留下的茶叶店。1945至1946年间，胡静之将“胡源茶叶店”开到了江苏泰州当时最热闹的彩衣街上，生意很兴旺。

胡锦涛是胡静之的长子，下边还有两个妹妹。1949年，胡锦涛7岁时，母亲过世，胡静之一直没有再娶，而是将三个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处抚养成人。胡锦涛18岁那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

就在胡锦涛十几岁时，中共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危机以及巩固专制统治，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胡静之的茶叶店当然也难逃厄运，其本人也变成了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

后来在文革期间，胡静之得罪了当地的一些人，于是被造反派诬陷其贪污公款，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甚至还被关了起来。据说，胡静之被关押的时候惨遭迫害，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有50多岁的胡静之含恨离开了人世。

当时年约36岁的胡锦涛正在青海任职，已经是副处级干部。当他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遂携全家回来奔丧。在安葬父亲前，胡锦涛找到当时的泰县县长陆某及供销社领导，请求为亡父平反，并开一纸证明。

为了达成这个心愿，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饭店泰县饭店摆了两桌酒席请领导们过去“喝喝酒、谈谈心”，但却遭到了冷遇，胡只好返回青海。从此，泰州成为胡锦涛的伤心之地，他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地避而不谈，26年来也再没有回过故乡。

温家宝叔祖被关押

温家宝是胡锦涛时期的总理。他出生于教师世家，祖父温瀛士生于1895年，曾在宜兴埠一所私立学校任校长，其弟温瀛阶，也就是温家宝的叔祖，是天津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温家宝的父母也都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父亲温刚是天津第三十三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杨秀兰是天津市区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

而温家宝的另一位叔祖，亦即温瀛士的幼弟温朋久则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成为一名外交官，是中共首任驻日内瓦的总领事。文革期间，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的温家宝被分配到甘肃酒泉，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1982年奉调入京，而温朋久夫妇则被投入了监狱，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

朱熔基被下放

曾任总理的朱熔基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熔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熔基一戴就是20年。

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朱熔基被上调到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尚属“内控人物”的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

文革期间，朱熔基再次被下放至五七干校。从1970到1975年的五年间，他所做的无非是养猪放羊、除草收割，直至1975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此后，朱熔基回到北京，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电力通讯工程公司任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之后，朱熔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是年9月，朱熔基终于

彻底去掉了他20年的政治冤屈。

1998年，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岁月时，一向敢言和畅言的朱熔基表情深沉。他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李克强父亲被打成“老虎”

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原名李敬德，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家人喜欢，被教私塾的爷爷视为珍宝、施以悉心教导。他不仅四书功底很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1929年李奉三加入中共后，吃尽了苦头。1951年中共针对全国干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李奉三遭到审查并被关押，还被打成了“老虎”。“老虎”是“三反”运动中对审查对象的称谓。据旧友回忆，李奉三为人直率，“三反”时，领导说了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李奉三十分生气，就拿起凳子打县委书记，因此被关押，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释放。

文革爆发后，李奉三预感到运动的可怕后果，“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他于是带着李克强从省城回老家避祸。

俞正声母亲入狱 妹妹自杀

中共政协现任主席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后改名为黄敬，曾任天津市市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8年因精神分裂导致摔伤，后由于医疗事故去世。

黄敬的早逝使他躲过文革一劫，但其夫人范瑾却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范瑾出身书香世家，其舅公是

大学者范文澜。范瑾是文革前中国少数几位身居要职的女性之一，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长。

1966年文革爆发后，范瑾被捕，并一直被关在秦城监狱单人牢房，1975年出狱时已失去言语能力，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而俞正声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受母亲牵连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而自杀。据俞正声透露，俞氏家族文革中有6、7人被害死。

王岐山父亲的病根

王岐山是现任中共中纪委书记。大陆《南方周末》曾刊登文章《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经历》，作者以王岐山儿时同伴的身分讲述了王岐山的家庭背景和少年成长经历。根据文章讲述，王岐山的父亲给人感觉性格内向、甚少言语。其实王岐山父亲的性格是因为一段挫折经历使然。王岐山的父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事土木工程建筑；日本侵华时，因为有抗日情结，曾经被国民党授予上尉官衔，并领取俸禄，而这种下了他在1950年开始的运动中被卷入、被抄家的祸根。受到惊吓的王父从此谨言慎行，因此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免遭整肃。

文革爆发后，王岐山父亲曾领取国民党上尉俸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他除了挨批斗，还被勒令打扫单位卫生。而这样的经历无法不在王岐山的成长过程中打上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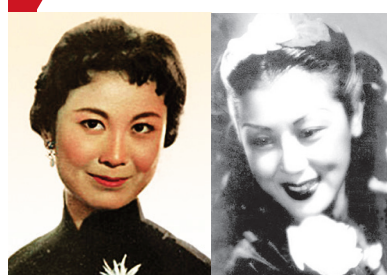
无疑，中共上述在任、卸任政治局常委们都曾领略过红色政权的残酷，但他们是否静下心来想过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来自哪里呢？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下一代不再拥有他们曾经的恐惧，面对着人民一次次的呼唤，该怎样选择一条让中国人民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已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题。◇

焦点

【特稿】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P2-P3



文革中自杀的十大名媛

»P4



国学大师陈寅恪之死

»P5



“乒坛三杰”文革自杀悲剧

»P6



北大才子王实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

»P7



中共的杀人历史

»P10

共产绝路

一百多年的历史显示，共产红潮所到之处，伴随着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共产运动重创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造成了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并令更多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

【大纪元编辑部特稿】

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1 共产主义的产生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出现。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巴黎公社的出现，到苏联、中共等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共产主义思潮曾泛滥一时。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共产极权制与民主自由制两大绝对对立的阵营。

一百多年的历史显示，共产红潮所到之处，伴随着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共产运动重创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造成了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并令更多人遭受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人间天堂”的假说，将十几亿人带入了“人间地狱”。其对信仰的迫害、对道德价值的摧毁、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恶劣而深远的影响。

在共产主义逐渐瓦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对此种学说抱有幻想，甚至有人抵制它的消亡，共产主义思潮在自由社会中仍以不同方式出现。因此，辨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杜绝共产思潮之祸害，对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至关重要。

共产主义的出现和传播与人类社会的两个重大变化有关。其一是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国家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每次都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企业和银行破产，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人们在苦闷彷徨中挣扎，对现实感到失望，从而进行反思，而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与机制还无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渐渐兴起。它把矛盾根源归咎于私有制，认为雇佣关系是赤裸裸的剥削关系，而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因此提出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相关事件是1859年《物种起源》的发表。进化论假说，推动人背离对神的信仰。共产党把“物竞天择”的理论带入阶级斗争之中，使“斗争”成为共产党维持政权的手段和动力。在追求经济平等的驱动下，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幻景迷惑了不少追随者。

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19世纪西欧的工人运动，以卡尔·马克思所



▲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镇反”运动现场。(资料图片)

著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基础。自从1917年苏俄共产党诞生后，共产党政权在各国相继建立，它们发动暴力革命，在各地制造了

连续不断的冲突和动荡，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秩序。

追求美好本是人之天性，无可厚非，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亦属

正常；但是，共产主义宣扬无神论，宣扬阶级斗争、仇恨与暴力，摧毁人们几千年来信仰、文化与传统，则将人类引向了一条灾难之路。

2 共产主义的背后

《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并非光明的学说，它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上信奉魔教。它背后是魔鬼的化身。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毕灵顿等学者的系统研究，共产党起源于18世纪德国巴伐利亚的光照帮(Bavarian Order of the Illuminati)，光照帮帮主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 1748—1830)是个魔教徒，信奉撒旦路西法(Lucifer)。“正义者同盟”，便是光照帮渗透和控制的一个外围组织。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布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同年11月，共产主义同盟“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宣言。次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运动开始兴起。

光照帮的邪教纲领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义均被共产党完全继承。例如，《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曾说：“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

残暴与欺骗，是共产党政权的共性。共产主义学说，以创建“人间天堂”蛊惑人心，实际却敌视人类。对人类的仇视，是所有共产主义思想“导师”的共同特点。近年披露的文献和学者研究显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撒旦的信徒，或者说皮相为人，撒旦为魂。

1. 信奉魔教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但是在大学期间加入了由乔安娜·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主持的撒旦教会，成为魔教的一员。

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而马克思的儿子艾德加于1854年3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中，开头一句竟然是“我亲爱的魔鬼”。

此外，马克思在诗作和所创作的剧本中几次写下“渴望向上帝复仇”，并多次流露出对世界的“仇恨”。例如，他在《绝望者的魔咒》诗中写道：“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仇恨。”



▲ 2010年柏林工作人员在将马克思塑像移走。(Getty Images)

马克思学生时代写过一部剧本《Oulanem》，其中宣称，他为了将人类拖入地狱而存在。他写道：“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看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仇视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认为他们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他称人即是“垃圾”，他们“粗言秽语”，是“一群混蛋”。

一方面，马克思在著作中声称无产阶级奋斗，另一方面他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他不信奉“共产主义”。他只不过是利用“共产主义”为圈套，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实现撒旦教的理想而已。最具讽刺性的是，对于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称之为“粪——污秽之书”。

2. 残暴的列宁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在外的列宁回到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共产主义对人类的仇视，从苏共这里开始演变为实实在在的暴



▲ 1991年11月，柏林工作人员将毁掉的列宁雕像抬走。(Getty Images)

政和屠杀。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信奉撒旦教一样，青年时的列宁也是如此。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托洛茨基在其写的《青年列宁》一书中提到，列宁16岁时，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这是撒旦教中常见的一种仪式。作家阿丽娜娜多次见过列宁，她写道：“列宁是个邪恶的人，他长着一对狼一样的邪恶的眼睛。”

“对革命而言，保证成功的可靠手段是消灭统治阶层和文化阶层。”列宁夺权后，便依此行事。1917年，他亲自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即“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并授予其全权逮捕、侦查、判决和执行的绝对权力，推行红色恐怖政治。1918年，苏俄建立了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

列宁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1922年，列宁在苏共的十一大上表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共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至当年年底，有200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

列宁的残暴，还表现在其对沙皇尼古拉一家实施灭门枪决。1918年7月，被关押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未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共有11人被处死，尸体经过焚烧并用硫酸毁容。而正是这位沙皇，在列宁流放期间，给予了他宽松自由的生活条件，每月还为他提供8卢布的津贴。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他临终时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其中提到，“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3. 独裁者斯大林

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他曾说：“最大的欢乐就是和一个人发展友谊，直到他信任地把头靠在你胸口，你就可以一刀插在他背上——这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斯大林15岁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背弃神，走向撒旦。日后，

当斯大林以革命者的身分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恶魔”，另一个笔名则是“恶魔般的”。

1912年，“斯大林”成为其新的笔名，意思是“铁人”。就连列宁都说，斯大林是“党内最冷酷无情之人”。而苏共党内的领导人布哈林曾这样评价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这些劳改营因为极端恶劣的条件而臭名昭著。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有50多万名古拉格劳改犯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发生了饿死800多万人的大饥荒。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演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共有200多万人被镇压。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 蒙古1990年移除了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国家图书馆前的斯大林塑像。(AFP/Getty Images)

4. 暴君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共供在“神坛”上的暴君。毛泽东一生都喜欢整人，他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同样嗜好暴力。毛泽东好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毛泽东执政期间，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些荒唐而疯狂的运动，造成数以百万甚至上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时毁灭了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可谓惨绝人寰。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当



▲ 艺术家高旒、高强的作品《下跪忏悔的毛》。(大纪元资料库)

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毛泽东肆无忌惮地说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共产主义对生命的漠视。共产党的暴力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共产党存在，它的暴力本质就不会改变。

纵观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人们都普遍敬畏上天、信仰神明，相信有天理在衡量人间的善恶。因此，人们能够珍视生命、心怀怜悯、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对维持人类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共产党却要从根本上打掉人们对上天与神佛的信仰，而把那些狂妄凶残、毫无道德底线的领袖们推上神坛，顶礼膜拜，并用政权权力强制执行，如毛泽东要人民不信仰而信他。这是彻底的魔教表现。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在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殉难者，在全球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于共产暴政的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如果不是魔鬼上身，如果没有对人类的极端仇恨，怎么可能制造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而且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几乎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在正常社会中，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早已被视为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变态抢劫犯。所以，共产党在组织形式上是流氓黑帮，背后是魔鬼的化身。



共产绝路

为害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共产党，背后是魔鬼的化身，必须远离和抛弃它。它带给人类的，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3 共产主义的“党国体制”

共产主义体制实行的是党高居于国家之上的“党国体制”。共产党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无处不在，党凌驾于一切行政机构、宗教团体和社会力量之上。党是真正的决策者。党控制着一切经济资源、个人发展机会甚至人的思想。党性高于人性，党的需要高于一切，党的正确性不容挑战。

但是，党的领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正确，因而，他们只能用不断的清洗和制造恐怖来消除那些指出他们错误的声音。在共产党的早期，他们会给对手扣上“修正主义”、“托派分子”、“反革命”等帽子，现在的罪名则“与时俱进”地变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毛泽东自己明明认识到“大跃进”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可是，当彭德怀指出这种错误时，毛就必须把彭德怀打倒。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彭德怀比毛泽东更正确，那么彭德怀就更有资格领导人们奔向“共产主义天堂”，毛就应该把最高领袖的位置让给彭了。所以当你提出与最高领袖不同的意见时，“篡党夺权”的帽子，非你莫属。

“文化大革命”时，刘少奇被打倒，也是因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向党的各级干部证明了他比毛更正确。毛因此不得不退居二线。但是，当毛一旦卷土重来，



▲ 在中共的“党国体制”下，即使国家主席也随时会成为牺牲品。图为刘少奇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资料图片）

刘就必须被置于死地。

由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错误不断、罪行累累，欠下了无数血债，因此中共随时都有失去权力的不安全感，尤其恐惧在失去权力后被追究罪责。

这种“不安全感”决定了共产党必然会监视自己的百姓（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老大哥在看你”），建立“一言堂”宣传系统以美化自身，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并禁止百姓发出声音；在内部强调“党性”，以保证领袖的意志可以贯彻执行；通过洗脑教育奴化人民，让人民误以为除了“党的领导”别无出路等。

4 对内的镇压

“党国体制”的建立，离不开暴力和谎言。对内镇压人民，是共产党政权的通用手段。

“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举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只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于是恼怒的列宁用机枪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用暴力清洗反对派和被怀疑为潜在反对派的所有人，执政的第一个月就杀死数十万人。

1918年6月，苏联强制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大崩溃。大陆学者的研究论文记述，“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75%的人口，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

为了压制民众的不满，列宁决定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斯大林上台后，更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

如此清洗运动，在中国也同样发生过。

从毛泽东夺取政权后不久制造的“高岗事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不仅那些替中共打下江山的人难逃噩运，大量的普通人在整肃中家破人亡。

共产主义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高权力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授权过程，也不需要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的神圣加冕。只要谁在暴力和欺骗上技高一筹，谁就可以戴上最高权力的王冠。

所以，从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到金正恩，因无“安全感”而怀疑、因怀疑而清洗、因清洗而屠杀、因屠杀而更无“安全感”，共产权力的运作便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到了2011年，中共用于国内镇压的“维稳”费用超过军费开支，足以说明中共百姓处于战争状态。中共认为，镇压百姓需要投入的资源比对外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所需的资源更多。

共产党的屠杀机器一旦开动，便难以停止。只能用更大的屠杀来制造更大的恐怖，以恐吓人们不去追究上一次屠杀的责任。在恐惧中，人们的不满虽然会被暂时压下，但是，下一次爆发只会更加猛烈，而这又将导致更大的屠杀。这就是共产党暴政解不开的魔咒。

5 对内和对外的欺骗

单纯依靠暴力的政权难以持久，于是，谎言出台，成为中共暴力的润滑剂。凡是维持政权较长时间的共产党，如苏共和中共等，都深谙欺骗之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高喊民主的口号，发布各种亲美的文章，不但令很多知识分子受骗、投奔延安，加入反蒋介石的合唱，而且连美国也停止支持中华民国，最终导致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大陆则沦陷到中共手中。

之后中共开始系统地篡改历史，将“万里大流窜”的败退逃跑，宣传为“北上抗日”的长征；将躲在陕北坐视国民党抗日的共产党美化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改写为“解放战争”；将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人祸“大饥荒”扭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将十年文革的责任全部推到“四人帮”的头上；将“六四大屠杀”包装为“平息反革命暴乱”；妖魔化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将数十万甚至达数百万人被劳教、被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人权灾难描绘成“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并大言不惭地

宣称“中国是个法制国家”。

对外，中共“喉舌”媒体大肆输出谎言，制造虚假新闻，欺骗国际社会，标榜其为“人民”服务，炫耀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权益所换来的GDP的增长数字。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共决定何时敞开国门、允许谁进来、让他们看什么、不能看什么、可以或不可以与谁会面。另一方面，中共每年耗资100亿美元，展开全面“大外宣”，以展现“软实力”为名义，实则对外渗透红色共产意识，将对内的严控延伸至海外，染指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企图动摇民主社会的根基。

在前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窃取了国家政权。而在欧美等许多自由国家，共产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在这些国家里，虽未出现共产国家的暴力形式，但是，其所实行的高税收、高福利实际上也和共产主义思维一脉相承，即“合法”地抢劫财富。此外，在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泛滥的国家，大多出现经济停滞、族群撕裂、背离传统等问题。

6 反传统和反人类的手段

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体制都是反传统的。为了配合镇压，它经常采用的宣传手法是：妖魔化某个团体，如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六四暴徒、法轮功修炼者等，以此煽动人民对某个被打击群体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统早已沦为“反人类”或“种族灭绝”的宣传机器，它所宣扬的道德观也是反人类的。

1. 经济上的反传统理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应该以勤劳和才智养活自己，做生意也要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抢劫”和“变相抢劫”。即使在当今的正常社会里，试问，谁愿意自己的合法财产、辛苦果实被别人强行夺走？人们出于善良和同情，施舍助人，那是人性美好的体现，但是，一个国家政权或任何人若公然抢夺他人的正当财产，则违背了基本人性与天理。

时至今日，中共的各种强拆、对私企和外企高额征税、对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收费、各种乱罚款、对自然环境的掠夺、对世界知名品牌的“山寨”和对外倾销等都是“抢劫”思想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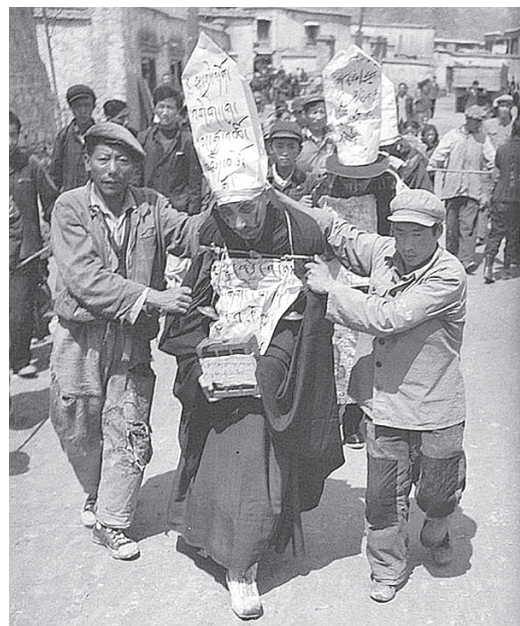
在西方社会里，为了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法律必须秉持公义，因此即使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其核心价值也与这些国家的传统道德和法律一脉相承。这也体现出，尽管经济和社会形式在变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稳定的、传统的。

反观共产党的“抢劫”则毫无公义可言，这种共产经济理论，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或是现代自由社会都无法接受。

2. “反人类”的道德观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因为来自神的诫命或者宗教经典，所以又可称为“普世价值”。佛家认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恶同存。正教信仰都是为了约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实和增强人的佛性。当魔性尽除，人将回归天国。人性中善的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中国人把良知称为“天良”。

而共产党却另外搞了一套道德体系，称之为“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造和训练“仇恨”，如雷锋所说“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在夺权阶段，共产党需要制造对现有统治者的仇恨；在夺权结束后，需要制造民众之间的仇恨以避免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对抗共产党的力量。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



▲ 西藏僧人 Rempu Rimpoche 被戴上高帽游街批斗。（资料图片）

等等。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共产国家的人们每天中午11点，要集中起来举行长度为2分钟的仇恨训练仪式，对着屏幕上出现的党的仇敌尖叫、咒骂，发泄心中的恐惧和愤怒。这个看起来荒谬的场景，六十多年来，其实一直在现实的共产国家里以其它形式出现。文革时群情激愤的批斗，呼喊“砸烂XXX的狗头”，到文革后的“严打”，再到针对“六四暴徒”的抹黑，还有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污蔑。偶尔还会有民族主义的表演，诸如针对台湾、日本、美国和各种“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的文攻武吓，都与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关。

共产党每次运动必先煽动仇恨，通过宣传机器将对手抹黑成走资派、修正主义、黑五类、叛徒、邪教分子等，为其镇压找借口。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系统败坏人类的道德，泯灭人的同情心和冷静的判断力。不仅如此，还用“人人表态”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沾上镇压的血债，至少是道义上的血债。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这表明共产党的仇恨训练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运动除了制造恐怖之外，也在试图摧毁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即摧毁良知。在共产极权体制下，一个婴儿在出生后则必须在政治运动中被改造成为丧失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扬“党性”至上，扼杀人性，就是“反人类”。



▲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破四旧”，图为寺庙中的佛像被付之一炬。（资料图片）

3. 毁灭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反传统的，在道德上是反人类的，因此任何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会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威胁。所以，在暴政下，传统文化作为道德的载体，无法幸免于难。人类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对文化的毁灭发生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损毁殆尽。

中共在夺取政权后首先开始消灭文化的最精髓部分——宗教：在“镇反”过程中大量屠杀宗教信徒，再派伪宗教学者打入宗教内部篡改教义。1957年，当几大宗教相继成立中共领导下的“宗教协会”后，中共在信仰层面的破坏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后中共开始在文化层面整肃知识分子，发动“反右”运动。

1966年，一批被无神论洗脑、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从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正步入烦躁叛逆的青春期。这时，中共发动了从器物层面毁掉中华文化的运动，即一场遍及全国、狂飙突进的“破四旧”，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毁寺庙、焚烧佛经、殴打教徒、焚毁古玩字画、砸烂文物遗迹、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难，民族之殇。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像中共那样污蔑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回顾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统、手段之恐怖、计算之精准、方法之恶毒，远远超过了普通人能够理解和想像的范畴，这也验证了《九评共产党》的论断——共产党是邪灵。

结语

一百年来，共产党在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中建立过政权。1亿人被屠杀、被饿死，无休止的掠夺，无所不在的告密和恐怖统治，不断地发动运动虐待人民，在自由社会里这些悲剧何其荒谬？而在共产主义的狂潮中，它却正当发生了，每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难以幸免。

如今，大多数共产政权已经解体，只有中国和朝鲜等极少数国家仍在撑着一面“红旗”。在这些国家里，真相被掩盖，赞歌仍高唱。红色的土壤尚存，毒素依然会滋长。此时，务必深思：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到底是什么？

有些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出路、一个办法，其实不然。实践证明，共产主义的存在，毒害了很多国家，它不仅令共产国家的世代民众饱受摧残，而且侵蚀了西方社会的文明和道德根基。

《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是邪教，是邪灵附体。共产党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出狡诈，

背地里干尽坏事，使用了各种手段来破坏人类。共产党因其撒旦属性，利用人类的弱点让人远离传统、背离神明，同时用各种欺骗手段麻痹人的良知，以暴力摧毁人的肉体 and 灵魂。共产党反对一切传统文化和道德，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毁灭人。

因为共产政权百年来的虚假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多人脑海里还留有印记，不少人看不清其本质与危害。在现存共产党的国家里，悲剧仍在继续，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尤其在中国，中共对“真、善、忍”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八年。但历史的车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自身在善恶中的选择。

在动荡、冲突、反思与期盼中，人类走到了巨变的前夕。面对纷繁世事、乱象谜题，真正的出路在于明辨是非、识别真相，在于回归传统、恢复道德。为害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共产党，背后是魔鬼的化身，必须远离和抛弃它。它带给人类的，不是出路，而是绝路。◇

► 2001年1月23日，中共喉舌央视在江泽民集团授意下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妖魔化法轮功。图中阳伞是央视提前准备的遮光设施。（视频截图）





名媛历劫

她们风华绝代，宛如降落人间的仙女，哪堪中共魔鬼般地凌辱？本是万千宠爱集一身，血泪冤屈无处诉，十大名媛被逼香消玉殒。“七仙女”严凤英，更是直接堕入“人间地狱”……

历尽文革劫难的“七仙女”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更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坠落凡间的“七仙女”——严凤英。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戏台上仙凡相恋的故事本源，其实讲述的是孝感动天的美德故事；严凤英在戏曲名家的光环背后，则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泪无限的伤痛记忆，至今仍是国民不堪回首的人间惨剧。

文：叶素

1 学戏，以生命为赌注

1930年，严凤英出生于安徽桐城，乳名鸿六。这个戏曲界的精灵，恰恰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在她成名以前，黄梅戏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唱戏的人更为乡邻所不齿。桐城人几乎都会哼唱一两首小调，但如果有人以歌戏为职业，便会受到家族的惩罚。严凤英自小耳濡目染，便爱上了黄梅戏，13岁时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艺。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使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别人学三遍才会的戏，她能一遍成功，大约一年后便登台献唱。

女孩学戏触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点被族人沉塘。为了保命，严凤英

只得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她在江淮一带漂泊，结识了永泉等老辈黄梅戏名家。每当老前辈在台上演出，严凤英都用心观摩，一点一滴模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细腻天性，她演绎旦角越发得心应手。

过去的人除看戏外，更讲究“听戏”，因而对演员唱功的要求非常严格。老艺人常常训练她，唱戏必须唱到前后左右的观众都能听清的境界。因在草台唱戏，四面都有观众，如果远处的人听不到，就会喝倒彩、扔石头起哄；如果听不清，就会讽刺演员“嘴里含个萝卜”。

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严凤英每天坚持吊嗓子、练身段，唱完戏



后还会特地询问站得最远的小贩，有没有听见、听清。草台搭戏的演艺经历，助她锤炼了精湛的技艺。

黄梅戏一行历来有“男怕《会母》，女怕《辞店》”一说，因《小辞店》要求旦角在台上演唱50多分钟，最考验功夫。而严凤英15岁时就能从容驾驭该剧的主角柳凤英，也因此更名“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她的唱腔明快清圆，演技惟妙惟肖，更善于吸收京剧、越剧、民歌等传统艺术的长处，表演风格自成“严派”一家。

就在严凤英醉心曲艺事业的发展时，戏外的世界，由于中共的建政，早已换了人间。那么严凤英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如何选择呢？



左图：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右图：严凤英（中）《天仙配》剧照。（资料图片）

3 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斗，对严凤英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初期，她因为演唱黄梅戏，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罪名，屡遭“文批武斗”的折磨。严凤英感到茫然。

1968年3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会”反江青运动的牵连，她与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蔑成“围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

与严凤英一同蒙冤的柏龙驹说，这次定罪发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便“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而他们反对样板戏的直接罪证，来自对观摩现代京剧一事的造谣和污蔑。

1964年，江青在北京发起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安徽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龙驹与严凤英等三位戏曲演员随后进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看戏时，他们仅从专业角度发表几句评论。没想到四年后，这次北京

之行被官方定义成“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安徽省观摩组与严凤英一行人，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68年4月5日，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发表歪曲事实的社论：他们围攻江青的革命现代戏。报上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次日，剧团内外的造反派轮番提审严凤英等人。

柏龙驹记得，那天是周六，造反派扣下严凤英，逼她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一千人的反动证据。尚存道德底线的严凤英明白，这是要通过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缄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饭时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则后果自负。严凤英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派要逼她出卖良心。周日晚，她冒着“串供”的风险来到柏家，倾诉内心的委屈与困惑，临走前留下一句话：“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4 在死神面前的批斗

4月7日夜，严凤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亚惊醒后发现了她的绝命书，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药求死。王冠亚只好一面叫长子请医务室的医生抢救，一面带着妻子的书信，向进驻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求救。岂料刘万泉不顾人命，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王家，对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刘万泉等人不理睬王冠亚的苦苦哀求，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泪流满面、口吐白沫时，这帮人才扬长而去。王冠亚趁机把妻子送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部。那时自杀的“反革命”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一律拒收，而且认为“反革命死

一个少一个”。王冠亚不敢离开妻子，只好让长子再去求刘万泉。

几经周折，长子拿来了介绍信，医生检查后却安排严凤英转移住院部。从市中心的急诊部到郊区的住院部，严凤英早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单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两个年轻的医生为她施救，却不见效。王冠亚看到一个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扫厕所，上前求他诊治。老医生却说：“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但是，没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斗、亲人的焦虑与医护人员的互相推诿中，严凤英于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停止了呼吸。还差5天，就是她的38岁生日。

5 尸骨未寒解剖寻罪证

对生命最残忍的方式，莫过于致人于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军代表，却还要千方百计地继续迫害死者。刘万泉出面，“揭发”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喝令医生当场解剖她遗体，寻找她吞下的“罪证”——发报机和照相机。为了这个不合理的罪名，没有学过解剖的医生拿来医用小斧，当众剖尸。

他先脱去严凤英的衣服，用斧头从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多片安眠药，什么罪证都没找到。刘万泉还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医生一斧劈开尸身的耻骨，致使膀胱破裂，喷出尿液。杀人魔鬼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后，刘万泉被评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还被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派出的调查组找到他询问严凤英一案，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说，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

十年之后，这场浩劫应如何反思，又该如何定罪？中共官方除了清算“四人帮”，为冤死者恢复名誉外，仍然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对当年的真相讳莫如深。这种善后策略，对上掩盖了元凶毛泽东的罪孽，对下淡化了一众暴民的罪行。

1978年，严凤英在悲惨离世的十年后，得到平反的虚名，当年一手导演人间惨案的军代表，一直隐匿在未知的角落，安度余生。

好在中国还有一批正义人士，彻底追查刘万泉的下落，曝光他的恶行，要给严凤英家人一个交代，还民众一个真相。

海外知名人士苏晓康、解滨等人，都公开撰文表示，刘万泉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规定，任何以极端残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规模残害他人的行为，即反人类罪。而文革时期出现的反人类罪犯，何止刘万泉一个？中共执政至今犯下的反人类罪，又何止文革一次运动？

2 《天仙配》和“七仙女”背后的故事

1951年，严凤英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干部与“新文艺工作者”渗入演艺界，“帮助”严凤英等“旧社会”的艺术家接触“新文艺思想”。因而，严凤英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外，还唱改编戏，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运动涂脂抹粉。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为宣传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现。中国人从古代到民国时期，对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合八字等诸多仪式，体现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领大

陆后，于1950年颁布“新婚姻法”，歪曲传统婚姻为包办、买卖婚姻，鼓吹自由婚恋。为推广新法，传统戏《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艺家”篡改成一部符合政治需要的新剧。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随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七仙女。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电影，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

的《天仙配》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跟风的戏曲电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严凤英，也成了为黄梅戏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包藏不住中共败坏传统文化、毁灭国民道德的祸心。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将神州大地变成血腥的修罗场，那些追随中共的文艺家几乎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严凤英几乎是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

文革中自杀的10位名媛

中共十年“文革”，惨案无数。

其中有不少美丽而知名的女性在“文革”中遭受凌辱，被逼选择自杀而结束生命。

上官云珠

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萃，又叫韦亚君，1920年3月2日生。电影表演艺术家。“文革”遭猛烈攻击，1968年11月23日跳楼身亡。

小白玉霜

小白玉霜，原名李再雯，评剧表演艺术家，白派传人。白派创始人白玉霜的养女。「文革」中遭受毒打后，她吞食安眠药自杀，年仅45岁。

言慧珠

言慧珠，北京人，蒙古族，1919年生。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文革」被批斗殴打，1966年9月10日自杀身亡。

顾圣婴

顾圣婴，1937年生於上海，有钢琴诗人之称。「文革」期间，一家人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在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后，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自杀。

严凤英

严凤英，安徽桐城人，1930年生，表演艺术家。“文革”中惨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身亡。

李翠贞

李翠贞，上海郊区南汇县人，钢琴家。“文革”中遭极大侮辱，她不堪屈辱，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精心化妆，然后拧开煤气自杀。

杨必

杨必，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钱锺书夫人杨绛之妹。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名著《名利场》中译者。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后自杀。

陈珺

陈珺，浙江慈溪县人，1919年生，系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女，被诬为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跳楼身亡。

赵慧深

赵慧深，四川宜宾人，表演艺术家，1914年生。“文革”中屡遭批斗，因饰演过妓女，遭肆意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朱梅馥

朱梅馥，大陆翻译家傅雷之妻。1966年9月3日凌晨，在遭受凌辱兵抄家和四天三夜的批斗践踏侮辱后，与傅雷在家中先后自杀。



大师之死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而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中经历中共统治的，个个惨遭迫害，“三百年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其中一位。

国学大师陈寅恪之死

文：林辉

与中共统治下鲜有大师不同，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所言，他们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而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彼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分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

然而，中共建政后采取的杀伐政策，不仅使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们一个个惨遭迫害，甚至惨死，而且也彻底使知识分子的脊梁弯曲。1949年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也是必然，因为出现大师的土壤已被完全完全地破坏。本篇说的是民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

陈寅恪这个名字，在民国时期可是响当当的。他，没有文凭，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其课



▲ 历史学家陈寅恪。(资料图片)

堂常常挤满来自北京其它高校的学生。他，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多种文字，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却为人低调、谦逊。他，虽潜心学问，却从不失傲骨，“思想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贯穿其一生，而他也极有可能是最早读过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2 洞穿马列主义危害

抗战期间，陈寅恪在成都病榻上与燕京大学研究生石泉谈过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觉得俄国人很可怕陈寅恪，没想到的是，从自己留在中国大陆的那一起，以俄国人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可怕开始触手可及。1950年前后，陈寅恪曲笔写了一首名为“经史”的诗来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危害的认识，诗中写道：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这首诗陈寅恪引经据典，还着实让人费解。后经几位学者多番揣摩考证，终于了解了诗的真意。

第一句中的“虚经”，指的是1938年起出版至斯大林逝世，在苏联重印300次、发行4,200万册的《联

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称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腐史”通常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受腐刑后写成的《史记》，诗中则暗示苏联学者是在严刑胁迫下写成的“虚经”。书中颠倒黑白，美化苏共上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大清洗，为斯大林镇压、流放上千万老党员、干部和农民的罪行歌功颂德，难免充满阴森之气。“溪刻”用的是《世说新语》的典故，指陈仲子行为“苛刻”，暗讽马列思想的残酷。显然，陈寅恪认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十分严酷可怕。

第二句“鲁论开卷语”指《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是说大学师生忽然异口同声，人人谈学习，个个学马列。“说瓜千古笑秦儒”是说知识分子为中共一网打尽而不自知。

全诗大意就是：马列主义教条禁锢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竞相学习马列主义，其实是自投罗网，尽入统治者的彀中。可以说，《经史》一诗是陈寅恪对后来盛行的政治学习的表态之作，之所以曲笔，自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击。

而当时的现实正如陈寅恪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共统治大局已定后，全国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

从1951年9月下旬，中共强迫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交待自己的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而采用的手段皆来自于延安整风运动，比如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一些知识分子不堪压力，或选择自杀或逃离大陆，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接受了效忠的对象是中共毛泽东。从此，人人言必称马列，著述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为荣。由于朝鲜战争，这一改造运动暂时中止，但几年后，中共掀起了对知识分子的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1957年陈寅恪在给朋友刘铭恕的信中有云：“弟近来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

历史学家余英时看出了此中真义：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陈先生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决不用“马列主义”啊！此陈寅恪之所以成其为陈寅恪也！由此亦可了解陈先生曲笔所写的《经史》一诗对马列主义危害的深刻认知。

3 遭疯狂迫害惨死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还披露了陈寅恪最后的时光和惨死的经过。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将矛头对准了这位早已双目失明的老人。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同时被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侮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随着陶铸被打倒在地，曾受其保护的陈寅恪的处境也变得十分艰难。助手黄萱被赶走，三名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景，夫人唐筼曾发出“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家财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查封，手稿被

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经千难万险、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陈家财物尽失。

造反派们为了验证中大流传的“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说法的真伪，将躺在病床上的陈寅恪拖下床，强迫其背诵毛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辱骂和毒打。

为了达到将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目的，造反派们想出了一个毒计：先是将几只大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当即抱头在床上打起滚来。

造反派们一见十分兴奋，遂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播放。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正月，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见

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相爱至深的陈寅恪夫妇常常相对而泣，感叹命运的悲苦。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亦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据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三百年一见的国学大师就此远去，真乃中国文坛之大不幸也！中共罪孽何其深重也！◇

1 北京赴任提条件

根据大陆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陈寅恪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离开大陆，从此命运便注定。他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喜欢历史”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红色学者”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为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为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篈。当时汪篈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篈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

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主张学术自由的陈寅恪还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没有答应，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此后，陈寅恪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在中南第一书记陶铸的关照下，在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

中共迫害致死的部分文化名人

熊十力 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国学大师。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儒学，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1968年5月23日绝食身亡。

蒙文通 1894年生，四川盐亭人。著名历史学家和经学家。1957年被划归右派后历尽折磨，1968年遭红卫兵毒打后不久含冤去世。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8月遭红卫兵毒打致死。

老舍 1899年生，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傅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



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68年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先后服毒、投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49年后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

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曾昭抡 1899年生，湖南省湘乡县人。曾国藩侄孙，与妻子俞大綱都是民国知名学者。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綱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四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 1898年生，江苏省上海县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

一。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学生熊大缜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一度精神失常，1977年1月悲惨死去。

饶毓泰 1891年生，江西临川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文革中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自缢身亡。

谢家荣 1898年生，江苏省上海县人。地质矿产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马连良 1901年生，回族，北京人。著名京剧艺术家，老生演员。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文革爆发后被打成“汉奸”、“戏霸”。红卫兵抄家洗劫后，将他关押在剧院小屋内，时常揪出批斗。马连良在凌辱和恐吓中，于

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8年12月18日借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吴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

邓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于5月18日含恨服药自尽。

杨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文革后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乒坛悲剧

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有三位来自香港的球员，被誉为“乒坛三杰”。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返回内地，叱咤乒坛。然而，1968年的4月、5月、6月，在两个月零四天内，这三人相继上吊自杀，永远离开了乒乓球台。

“乒坛三杰”文革自杀悲剧

文：高天韵

1 傅其芳 (1923—1968)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小学时开始乒乓球训练，后去香港谋生，在乒乓球房当陪练。他曾经击败到过港的英国名将，渐渐有了名气，受邀参加了东南亚的一些比赛。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

于是，1953年，傅其芳回到内地，希望报效祖国。他先后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取得佳绩，并且潜心钻研乒乓球技术，见解独到。他明



▲ 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的傅其芳。(资料图片)

确指出，中国的乒乓球球员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

从1958年起，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他知人善用，指导容国团夺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冠

军。接着，在1961年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率领中国队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斯韦思林杯。

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了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为此，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傅其芳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傅其芳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其芳还与梁焯辉教练合著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分，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3 容国团 (1937—1968)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离此地不远，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年迈的老父正等着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区幸福大街，而幸福离他太远了。

容国团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他出身贫寒，爱打乒乓。少时，他凭借独创的直拍技法成为“街头球王”。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

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当天夜里，他激动地写下日记：“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

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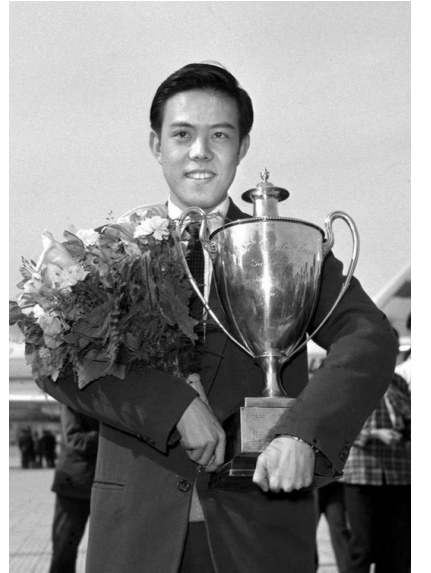
容国团获胜后，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后来他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当有外国政要来访时，容国团经常是座上嘉宾。1958年，容国团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他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荣誉过后，风暴降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烈火使体育界沦为“重灾区”。贺龙受到批斗，中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也被炮轰。

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倍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



▲ 凯旋的容国团摄于机场。(资料图片)

治，钻进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霎时间，“砸烂独立王国”“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狂风骤起，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都被撤销，国家体育系统除留下不到1/10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体育器材被销毁，运动场地被破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队伍，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失去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同时，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因为请战信，容国团被批为“修正主义”，被“体委红旗”和“清中红卫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贺龙、荣高棠黑帮的铁杆保皇派，参加了“反革命特务小集团”（因其与几名国家教练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等人有时一起吃饭）。此外，1957年，广东省委争取他回广州参加广东队时，体委办公室通知深圳海关，不用检查他的行李。红卫兵专案组又借此怀疑他偷运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抢掠。还有，容国团爱看外国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脚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

容国团留下的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杀，虽然未以此定论，但结果是，他没有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并用他自己的部分工资承担。

1978年，中共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并补开了追悼会，后来还评选其为最杰出运动员之一。

4 结语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选择了“新”中国。一心向“党”，他们奉献出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他们被“党”发动的斗争批倒、诬陷，含冤而死。许多年后，大陆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元老。然而，人已离去，空留遗憾。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恶浪中，千千万万善良的生命被淹没吞噬。十年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砸碎了无数文物古迹，多少科技文化界、音乐界、体育界、艺术界的精英惨遭迫害。自杀的悲剧潮，由中共暴政催发。受难者热爱生活，锲情事业，却承受不住“运动”的重压。他们告别亲人，含恨而终。悲剧，不断地重演。今天，暴政体制犹在，悲剧，如何结束？

一代英杰，熠熠生辉，命断红潮，何其哀也。◇



▲ 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捧得“斯韦思林杯”。教练傅其芳（左四）与容国团（左三）、姜永宁（右一）等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2 姜永宁 (1927—1968)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人，出身贫苦，在香港捡煤渣长大。1952年回国后，他获得了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1963年，姜永宁调任北京队总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姜永宁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他生活简朴，喜欢摄影、读书和看报。他工作刻苦，沉默内敛，与世无争。他被调到北京体委后，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到达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尽心尽力。入夜，他还要撰写训练计划。他善良热情，观众来信询问打球事宜，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帮助购买后钉在木箱内寄出。

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

据姜永宁的女儿姜小英回忆，“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搨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组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

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的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人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批照片。

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买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几个壮汉抄起棍棒，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

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

姜永宁离世后，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她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孙梅英后来告诉女儿小英，在被关押期间，她挨过打，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艰难的日子里，孙梅英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便强忍痛苦，坚持活下去。



▲ 姜永宁生前与女儿姜小英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资料图片)



王实味

一提到野百合花，容易想到王实味。王实味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招来了杀身之祸。野百合花象征纯洁、质朴和草根性，王实味的悲剧令它染上了血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象征。

北大才子王实味和他滴血的野百合花

■ 本版撰文：玉清心

今年是王实味遇难70周年。在中共历史上，王实味不是第一个被冤杀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是延安整风运动被拿来祭刀的第一人，他是中共延安整风运动的牺牲品。

王实味1906年4月生于河南潢川，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乡办学，家境清贫。他幼年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和胡风同班，后因经济困难，只读了两年，1926年1月他加入了中共。1930年和北大同学刘莹结婚，生有一双儿女。

1 才华横溢

1926年，王实味在北大上学时，已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创造月刊》、《新月》等赫赫有名的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中、短篇小说，受到了诗人徐志摩、评论家陈西滢等的重视，《现代评论》还破例给了他三十元稿费，这件事曾被传为文坛佳话，甚至载入了文学史中，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

1930年，他的中篇小说《休息》被编入“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包括了沈从文、胡也频、徐志摩的作品。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提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2 投奔延安

1937年，31岁的王实味经范文澜介绍投奔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个性耿直，看不惯顶头上司陈伯达媚上压下的嘴脸，导致和领导关系紧张。但三年间，他参与了大量对马列著作原作的合译与单译，有一两百万字。他的很多译作直到中共窃国后还在再版。当然，那些译作上早已没有他的署名了。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不再翻译外文著作，开始写文章。

3 发表《野百合花》

1942年3月，王实味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五千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分两次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同时，他在《谷雨》刊物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同月，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上，贴了几篇针砭延安时弊的文章。

他的文章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

动。毛泽东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毛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野百合花》里，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咏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歌舞升平景象。

短文里表达了他朴素的人性观念，这些应该与他的家教、北大学府的教育及他在西方文学方面的造诣有关。他追随马克思主义，但不真懂，他把他们理想化了。他经常说“史达林人性不可爱”。骨子里，他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善良的追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其实未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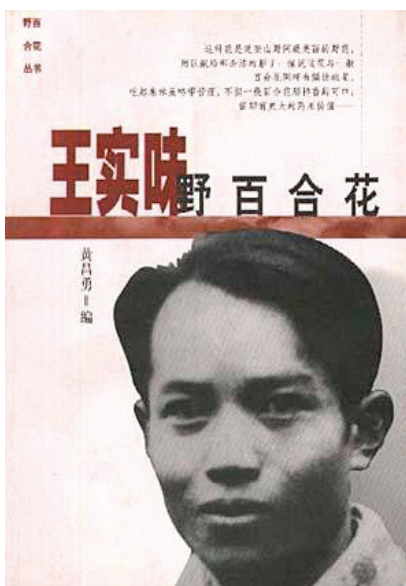
他的真话，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他的勇敢，在鼓舞大家也畅所欲言。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有95%的人都支持他的观点，对陈伯达这样的领导发起批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面。各学校、机关纷纷效仿，办起内部刊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地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丁玲任主编的《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他们作出深刻检查。

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毛的批评意见，他置之不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贱、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了。

4 被选定作靶子

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担心刚开始的整风运动变调失控。于是，毛改变了原先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



▲ 王实味因一篇叙写延安生活感受的杂文《野百合花》被杀。图为大陆近年出版的王实味文集书影。（资料图片）

味作为靶子，先将反党的“自由化思潮”打压下去。

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发出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上。

4月3日，中宣部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四三决定”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整风不久就转入了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

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对王实味的批斗。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95%，很快变为他的对立面。他们被吓得不知所措，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做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6 惨死

1947年3月，因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已被囚禁了四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实味也由中央社会部两名干部押送，随中央机关撤离。4月16日，到达山西省兴县，晋绥公安厅主管审讯与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设在那儿，王实味被移交给这个看守所。

6月12日，看守所被飞机炸毁。对王实味这个中央级要犯该如何办？驻在临县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接到报告后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5 开除党籍被捕坐牢

1947年7月1日晚，一个手提砍刀的年轻干部走进一孔小窑洞，拖出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处，手起刀落，殷红的鲜血喷洒到干硬的黄土地上，染红了野百合花……死者是王实味。因怕被人认出，他被乱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丢在枯井内。

7月1日是中共建党日。嗜血成性的中共，偏选在那天杀害王实味。当年为整风运动拿他祭刀，摧毁扼杀了他的全部心智。这还不够，最后用他的生命为党庆做了祭品。王实味19岁入党，31岁到延安，41岁被中共杀害。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中共建政后，她四处寻找丈夫。得知人已经被处决，她确信王实味是被冤枉死的。多年来她和儿女不断向中央写申诉信，多次到北京上访。

1962年李克农临终前向刘莹承认，“王实味案”是纠缠她多年的一块心病。当年也落井下石的李维汉，1981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的建议。直到1991年春，公安部来人通知85岁的刘莹：王实味平反了。

生命已逝，平反有何用？在“延安整风”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被整死了。中共整人，恐怖到把人整得“求生不能，求死不能”，不少人跪下来磕头求饶都难免一死。王实味这样的悲剧，后来一直在不断上演，至今没停。◇

多少“逃港”知青魂飘大海

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每次逃亡大潮，都出现在中共政治动荡大开杀戒或经济危机民不聊生的时期。文革期间的“逃港”，曾有过一天逃港7万人的“井喷”纪录。文革逃港潮的1971年—1974年期间，知青是主力军。

《偷渡香港》作者陈通教授于1979年冒险逃到香港。据他调查统计，70%的逃亡者是失败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机会成功到达香港。

他说，最保守地估计，当一个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时，至少有一人死在逃亡途中，还有许多人逃亡失败被抓捕毒打、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被枪毙、被饿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杀。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万人死在偷渡路上，两千多万人参加偷渡香港这一行列。

当年有多少知青卷入这场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据民间调查，在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卷入偷渡潮的都有。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所中学，该有多少人？他们历经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陈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广州培英重点中学，那是座百年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但1968年，将近80%的初高中

生，约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乡。这些学生下乡两年后，197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逃港，汇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惨烈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民警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个钟头。中途所见，永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敢偷渡。——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我们那条船船员说捞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

上面这段表述，来自一名逃港知青的亲身经历。知青死于偷渡的确切人数虽然至今不知晓，但其惨烈过程有很多亲历者。上面这段口述历史记录，或许也已经对死亡数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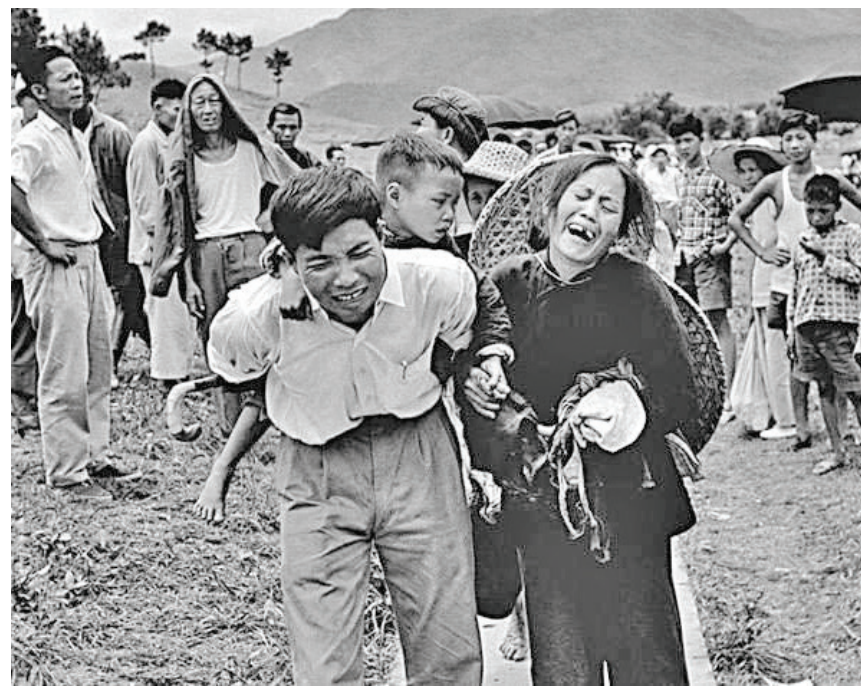
据和失踪的梁启光同住一茅草

房的知青回忆：“那天他们四个在我这里吃饭。梁城根不是我们队的，在东瓜宇大队。我隐约知道他们是商量偷渡。吃过饭后他们就动身了。大约过了半月，快过年了，梁启光的姐姐到我这里来找弟弟，说她家在香港没亲戚，应该不会是……我说那天你两个弟弟在我这里吃完饭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门，她就大哭，说现在没有一点音讯……其实，梁城根的母亲也一点都不知道儿子走了，以为他还在农村。以后听说是台风翻船死的，都没有办法证实，不过我记得他们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风了……”

另一同学赵X琦回忆：1973年的7月，偶遇沙螺湾大队民兵营长刘金喜，他问谁叫梁成根？原来，一年多前，刘曾接到宝安县的通报，说在一具知青的尸体上找到一张“南沙公社东瓜宇大队”的证明，尸体是被宝安渔民的拖网船捞到的，然后就扔到宝安让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风的那个夜里，有四条年轻的生命，陨落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来，亲人们始终在苦苦寻找，等待他们突然归来，因为无法接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 1962年5月大逃港的一张经典照片。港府受不了狂潮般的逃港客，大量遣返大陆。被遣返回乡的一家人痛哭。（资料图片）

当年广州“老高三”知青黄东汉说，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下，或惨死在枪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当年偷渡死亡数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道了！但肯定不是个小数字。

1978年夏从汕尾出发的一条小木船在大亚湾沉没，45个年轻人无一生还。黄东汉说，他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和一个街坊一同葬身大鹏湾。1973年12月里，从碎石斜坡滚落下来的胡向坤苏醒过来时，发现10米外的两个同伴早已气断身亡……

逃港知青说，我们不是英雄，

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们本该升学读书，追求理想，却被迫“起锚”、“扑网”、“蹈海”。我们的青春如同一场噩梦，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幸存者，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了纪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个个在逃亡过程中消逝的生命，记录下的是中共暴政带来的苦难。

碑址选在了逃港中丧命最多的大鹏湾沙头角岸边，以纪念那些消失在漫漫长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飘大海的青春伙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



浸血的反右

“反右运动”是中共于 1957 年发起的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大型政治运动。当时中共鼓励人们“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许诺“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抓了 55 万名右派分子。毛泽东称之为“阳谋”。

反右运动——浸血的世界纪录

文：高天韵

2008 年，一部四卷、120 万字的《五七右派列传》问世。该书秉承“厘清真相，还原历史”的原则，共有四百余篇传记，涉及 1,318 名右派（含少数中右），重点介绍大陆各界、各路右派的划右原因及受迫害经历。作者申渊，本名陈榆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 年加入中共，1958 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放逐内蒙古边疆劳动。

上千个右派的悲惨故事，深刻揭露了“反右运动”的残酷和中共的邪恶本质，其中被划为“右派”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摧残，令人震惊又震颤。一名又一名被定性的年轻人，在错愕中，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被发配劳教，有的从此迈向一条不归路。

中共发动的这场运动，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波及了数百万中国民众。它所创下的黑色世界纪录，饱含生命的血泪、透着灵魂的哀歌。

2 “噩梦醒了吗”——李曰垓

云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 年 12 月 23 日出生，刚满 16 岁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作为一名少年思想犯，从 1958 年元旦过后到 1978 年底，李曰垓总共渡过了 20 年零 8 个月的劳改岁月，期间三次遭逮捕入狱，长期戴脚镣手铐，曾关在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 300 万字。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曾前往昭通采访李曰垓的案情，在查阅其档案和访问有关人员后，写出了报告文学《石板下的一棵小草》。

作者写道：“李曰垓始终不知道自己犯有什么错误，过了二十年后平反昭雪时，才知道自己有什么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是，这些言论，都是当时在整风中响应党的号召，在本单位负责人多次动员下说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是一个纯朴的公民向党进忠言……”

李曰垓是一个“红小鬼”。他 13

岁参加“革命”，后担任昭通市专署机要员。1958 年元旦过后，16 岁的李曰垓被专署“下放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在冰雪中步行五天，赶到 300 里外的彝良县大坪农场报到。到达时，场部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李曰垓听了大吃一惊，自己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呢？一个月后，他从农场逃跑，打算走路进京申诉。可是，他只走出了几十里，就被抓了回去。几个月后，他又被捕、判刑六年劳改，刑满后仍长期被囚禁，整个文革期间都关押狱中。

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络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语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 21 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李曰垓剖析指出，“反右”是暴

力体制毒素分泌的必然，而非此运动染黑了体制。“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者利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威胁到民族存亡，反右灾难在延伸 22 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律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 41 条而不作善后处理，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帐。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证明，反右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

3 反右——浸血的纪录

著名学者胡平在《1957·苦难的祭坛》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

2009 年 1 月 15 日，李曰垓的“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反右”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文字狱，作者并且探讨了“反右”运动欠帐的法理认定和解决方法。

李曰垓写：“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的摧残、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工伤、殴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逼使自杀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右派集中营成为普遍现象，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超过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多少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世界历史考证的严峻课题。”

有关“反右”所迫害和波及的人数，作者引用了几组资料，得出惊人的结论：“官方公布：有公职的右派 552,973 人，1979 年‘改正’了的 552,877 人，整错者竟达 99.98%，而又故意留下 96 人不予改正，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 1979 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荒唐逻辑不准反驳。但这 96 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国人公布。”

2008 年，《五七反右列传》的著者陈榆林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之所以要写右派历史，就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共产党害怕的不是



▲ 12 岁的张克锦曾为邻居的「鸣放」配了一幅漫画而被划归“右童分子”，入狱七年。图为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的鸣放园地。（资料图片）

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陈榆林认为，右派数字不止官方公布的 55 万，他的估计是约有 120 万人。

《五七反右列传》还破了另一项纪录——“右派分子”的年龄下限。原来，年纪最小的“右派”既不是佟信顺，也非李曰垓，而是四川达县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张克锦。当年，12 岁的张克锦为邻居的「鸣放」配了一幅漫画，邻居被划右后跳桥自杀，而这个小小画童经领导认定，冠以“右童分子”。1958 年，张克锦被送狱七年。1979 年，一份“改正通知书”送达至他曾就读的那所小学，为他的“右派”生涯划上了句号。

陈榆林说：“虽然我已经沉默了

将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赛尔和苏俄布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为历史留下的见证，我还有理由犹豫和逃避吗？难道我要把这些刻骨铭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带进焚尸炉吗？”

陈榆林表示，共产党的做法掩盖真相，试图让人们忘记过去，“共产党认为你人很计较，大家忘掉算了，现在生活怎么好，这就等于容忍他们重复犯错误。他们为什么要封杀我这本书？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础就垮台了。”

暴政的罪恶和历史的沉重，由于诸多幸存“右派”和学者的勇气，得以曝光世间。今天，不幸的是，相似的悲剧仍在上演，更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还在持续进行着。◇

1 佟信顺——向美国总统问民主



▲ 中共 1957 年发起反右运动。（维基百科）

佟信顺（1941—1960），北京人，家庭出身三代都是工人，根正苗红。初中毕业后，佟信顺进入北京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学习。1957 年整风鸣放开始，佟信顺出于好奇，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写了一封信，请教他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起来的。结果，就因为这封信，他被扣上“极右分子”的帽子，被押进了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然后再送到茶淀农场进行劳教。

在茶淀农场，佟信顺被编在赵文滔的小组。赵文滔是北大的学生右派，作为“犯人”担任小组长，给予 16 岁的佟信顺不少关照。赵文滔在其长篇回忆录《伤害》里，记叙了佟信顺的遭遇。

“刚进入劳教农场，犯人要自报身分，让管教干部和其他犯人了解自己、监督自己，便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佟信顺自我交代自己的罪行说：‘信搞砸了，不知怎么搞的，信又回到了党支部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便把我送到这儿了。’他一片茫然，始终不明白出了什么差错。”

1960 年，佟信顺被调往别的小

组，与关照他的赵文滔、刘佐汉分开了。“大饥荒”发生半年后，有一天，赵文滔在收工的路上看到了小佟。“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几步，赶到我身旁嗷嗷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两腿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动了，我，我……’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 18 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的消瘦得只一层干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跟饿殍一样。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在这次见面后大约一个月，小佟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他的哥哥前来收尸，“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赵文滔写道：“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生命！”

命丧“反右”运动的胡适之子

文：林辉

胡适，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38 年至 1942 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其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影响都不可小觑。由于追求自由思想的胡适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成为中共大规模批判的主要人物。

胡适育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次子胡思杜。生于 1921 年 12 月 17 日的胡思杜，年少时患过肺病，因此读小学时辍学。胡适为此曾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其家庭教师。后来他重新入校读书，但并不属于聪颖那类的学生，而是喜欢交朋友和玩乐。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 1939 年、胡思杜于 1941 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 年，当他与父亲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时，许多人看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 年 12 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



▲ 1948 年胡适江冬秀夫妇与二子胡祖望（后左）、胡思杜（后右）合影，胡适时任北大校长。（资料图片）

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而不是随父母南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 年 9 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次年 9 月 11 日，胡思杜写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

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 年，中共为了加强对思想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

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并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说，在唐山工作期间，胡思杜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作为父亲“赎罪”。

胡适在 1950 年 10 月 7 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 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分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分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分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

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学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手车托运回北京。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将大部分书都烧了。那份“遗书”的抄件也被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 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如今，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米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1980 年，胡思杜被中共当局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地下有知的胡思杜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共会作何感想呢？◇

大饥荒纪实

1959至1961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劫难降临中国大陆：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各地上演着“人相食”的人伦惨剧。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祸”，至今仍是大陆官方极力封锁的历史。

大饥荒纪实

中共三年人祸致死四千万人

1 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倾尽十多年的心力调查研究并完成了约100万字的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记了10多本访谈录。

书里的资料都是内部资料，档案、会议记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我当时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采访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分社各个社长帮忙，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

其间的艰辛难以言状，费尽了周折，有的地区还是不让看。他两次到通渭，都没能进入通渭档案馆。后来经高层朋友的帮助，他在甘肃省档案馆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档案，在河南省档案馆看到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阳档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资料，在摄像头下抄写了8个本子，有的资料审查后再到他手里已抽走几页。不管怎样，他还是抄阅和复印了数千份原件。

他反复查证，数易其稿，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实、详细的考证和数据，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揭穿了长期以来官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

1960年7月，苏联撕毁了600份技术合同，撤走专家，其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那时大饥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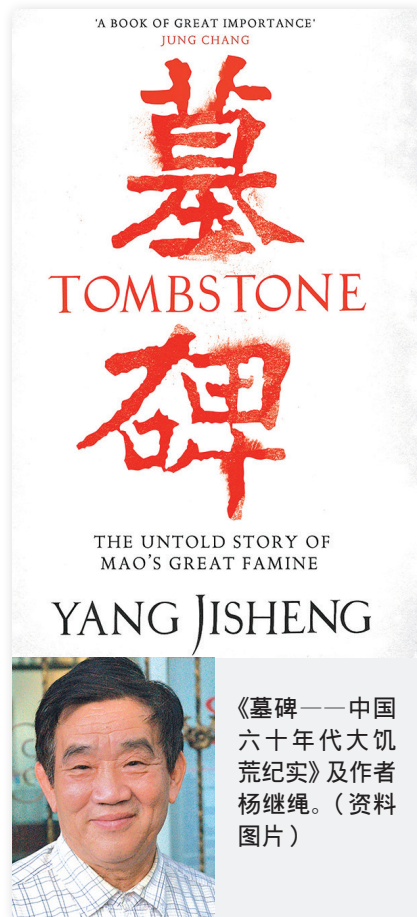
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苏联六一年3月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中共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没有苏联逼债这回事，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了债务。

杨继绳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并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那三年是气候正常的年景。

这场惨烈的大饥荒，非“天灾”而是“人祸”，根本上都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大修水利、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浮夸风、公共食堂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民众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夸大粮食产量，导致征粮过重。所有的财富、资源、土地都被政府垄断，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农产品换回工业生产用的机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腾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青壮年都投入炼铁和修水库，耽误了农时，庄稼来不及播种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芜。粮食大量减产，各省却“喜报频传”，陷入“亩产万斤”的吹牛狂欢。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谁不听话就不给饭吃，“扣饭”是普遍现象。

一些地区农民想开荒种地、在自家吃饭也不行，自留地收归集体，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里的烟囱不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及作者杨继绳。(资料图片)

许冒烟。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最不可饶恕的是：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眼看着农民饿死；在上千万农民饿死时却大量出口粮食，仅1959年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的粮食就达416万吨；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没有开

仓放粮，还更疯狂地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继续超限度强行征粮，宣传形势一片大好。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为自保不敢说真话，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于是层层施压、不择手段地逼迫上缴粮食，把农民仅有的口粮、种子、饲料搜刮一空。捆绑、吊打、拘捕等现象屡见不鲜，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越来越稀汤寡水，后来变成一顿没一顿，渐渐也不开伙了，干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惨了，饥肠辘辘，饿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肿病，哪还有劲儿出工劳动？走路摇摇晃晃，头昏眼花，很多人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起来。

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严防死守，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像轰动一时的湖南澧县刘家远杀子食子案，绝非个别现象。杨继绳在书中记叙了多起吃亲生儿女的事件。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讲，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刘少奇最让毛泽东恨之入骨的那句话就是：“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死得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正应了那两句毛诗：“千村薜萝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文：沉静

1959至1961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劫难降临中国大陆：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各地上演着“人相食”的人伦惨剧。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祸”，至今仍是大陆官方极力封锁的历史。

继中共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饿殍遍野，出现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中共对外宣称“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而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天灾、战争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夸、冒进的错误政策所致。

尽管中共极力抹去历史的记忆，但有关大饥荒的细节与真相，被《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彻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难以回首，作者杨继绳却努力挖掘出当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说，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完成这部巨著，是为历史正名，也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并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现年76岁的杨继绳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和顾问。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被迫离任。他还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作过访问学者。



▲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人民日报》等登出照片并配说明：“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软绵绵的沙发上似的。”(资料图片)

2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饿死多少人，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发现全国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周恩来看后通知：“不要外传，立即销毁！”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几天后，周恩来又问：“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杨继绳零三年采访周伯萍，他只讲了经过，不肯透露具体死亡数字。

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数，杨继绳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学家请教过，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几乎找齐中外人口学家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计算结果；还把分省的三十册《中国人口》有关资料数据逐一抄录，列成表格，再一个省一个省计算。每天下班后就计算，一个晚上只能算出一个省。他珍惜每一个数字后面从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600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谔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说，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万。

1962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进京告状，四川大饥荒至少死了1,000多万人。胡乔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是湖南大饥荒期间死亡率严重的达20%左右。贵州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粮食供应不断减少，一般市民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也很普遍，从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却是全国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中国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5,000万人”。荷兰学者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估计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是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时期死亡人数的20倍以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是学人口统计专业出身，当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还到一些省搞过人口数字核对和调查，他的研究结果是3,546.6万人。杨继绳多次与王维志进行过探讨，基本同意他的结论。杨继绳说，他的3,600万是保守数字，还没包括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120倍，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1,000多万的死亡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1962年5月1日至28日，有6万从大陆逃到香港的中国人被香港政府遣返。图为难民将手伸出车外要食物。(AFP/Getty Images)



中共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大饥荒，数千万中国民众死亡。(资料图片)

3 极权制度的墓碑

《墓碑》分为各地情况展现和综合专题论述两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丰富，客观写实，严谨朴素。从祸起中原、甘肃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国的饥魂、鱼米之乡的饿殍，从燕赵悲歌、齐鲁之难、黑色贵州到岭南风云的逃港狂潮、云南边民的大外逃……杨继绳描绘的是全景立体的灾难图，有侧面、有细节，有群像、也有个体和特写，呈现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所发生的“共惨人祸”，触目惊心，惨不忍“读”。作者深刻地分析论述造成大饥荒的时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认为其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等共产国家（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都曾发生过惨烈的大饥荒。而在任何一个民主、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饥馑。极权制度是大饥荒的根本祸因。

杨继绳指出：“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近四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松动了许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

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大陆史学界对三年大饥荒这段历史的研究空白。“中国现代史学会”认为，这是迄今关于这场大饥荒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著作，“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年人祸，4,500万冤魂，在中共的导演下变成延续半个世纪的谎言。这场灾祸，不仅让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更在思想上禁锢并愚弄着今天的中国人，遗毒无穷。当历史渐渐远去，记忆渐渐模糊，一部正义敢言的著作犹如冲散迷雾的劲风，而中华民族的觉醒也将为中共体制竖一块真正的“墓碑”。◇

中共杀人史

中共 1949 年建政以来，在和平时期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从杀 AB 团、延安整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中共从 1921 年建党之初到今天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 记者戴安综合报导

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1949 年夺取中国政权。在其暴政统治下，约 8,000 万人因为迫害、饥饿、枪杀或其它非正常原因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1953 年，新疆阜康，中共军管人员枪杀“地主”和“反革命分子”。(National Archives)

中共的杀人历史

1 杀 AB 团

AB 团是中国国民党中的反共者于 1926 年 12 月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团体，1927 年 4 月解散。1930 年下半年，中共在内部发动反 AB 团的肃反运动，大量杀害党内工作人员。1930 年 12 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军在江西富田发动兵变，攻占了富田县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逮捕了中共当地政府人员。1931 年 3 月 28 日，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派出任弼时等人前往中央苏区，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4 月 18 日，红二十军兵变的领导人在前去参加原定的谈判时被逮捕，不久即被全部处决。7 月，红二十军被调

至江西平头寨，被彭德怀和林彪率部包围缴械，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及 700 余名副排长以上军官被集中到平安河坝上进行处决，“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富田事变后，各地的反 AB 团运动掀起新高潮，审讯手法异常残酷，“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洋钉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江西苏区人人自危，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 团分子”，共有 7 万多人先后被杀。中共后来承认 AB 团并不存在，绝大多数被处决者都是无辜的。

2 延安整风

1942 至 1945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整肃运动，采用了审干、肃反等红色恐怖和流氓手段，建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动的“抢救运动”，直接导致了上千人死亡。其中最著名的受难者是知识分子王实味。王实味于 1937 年到达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翻译了 200 多万字的马列著作。从 1942 年 2 月始，王实味响应毛的号召，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

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文章，描写延安“新生活”的阴影，质疑中共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倾向。王实味的文章是对毛思想的挑战。他因此被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3 年 4 月 1 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1947 年 7 月 1 日夜，在山西兴县，王实味被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被大砍刀砍死，尸体被扔进一口枯井。

延安整风运动里死了多少人，从没有公布过。但是自此以后，再没一个人敢对党说“不”了。

3 长春围困战

1948 年 3 月 13 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四平，长春成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一座孤岛。1948 年 6 月 7 日，毛泽东正式同意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案。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蒋困死在城里。”

由于城中存粮只能维持到 7 月底，7 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要求从 8 月 1 日起疏散民众。但是共军的做法却是“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围城三个月后，9 月 9 日，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联名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以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原吉林省政府参议兼驻长春代表段克文曾撰文回忆说，共军哨兵看到难民走近便说：“老乡，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再前进，我们只好开枪了。”难民哀求道：“我们都是善良百姓，怎能忍心在这儿把我们饿死呢？”共军回答是：“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也不敢违背纪律。”有人不顾一切走上前去，“砰”的一枪就一命呜呼了。

1948 年 10 月 24 日，南京《中央日报》在《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 6 月末到 10 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 15 万具。”

国民政府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应为这一问题负责。

4 镇反、土改

中共在 1950 年 3 月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这个“千分之一”，就是镇反期间中共定下的杀人指标。实际上，最后所杀的数人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 300 万人左右。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 1949 年初到 1952 年 2 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 157.61 万多人，其

中 87.36 万多人被判死刑。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 100 万到 200 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与“镇反”同时轰轰烈烈展开的是“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九评共产党》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

据中共公布，到 1952 年底消灭“反革命分子”240 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 500 万人。

5 “三反”、“五反”

1951 年到 1952 年 10 月，中共开展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企业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处决了腐败的中共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

干部变坏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 1 月开始“五反”。“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写：“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

据 1996 年《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万 3,100 余人被逮捕，280

余人自杀或失踪；在 1955 年“反胡风运动”中，有 5,000 余人被牵连，500 余人被逮捕，60 余人自杀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 21,300 余人被判死刑，4,300 余人自杀或失踪。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著《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 1948 年到 1955 年，有 400 万人被处决。”

6 大饥荒

1958 至 1962 年，“大跃进”的浮夸风、强制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公共食堂制度，导致一场大饥荒席卷中国大地。

据前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 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达

1,750 万吨。本来当年收成不错，可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饥荒。

中共近年数据“解密”，承认在大饥荒中有 3,756 万人被饿死。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数据是，大饥荒死亡人数为 3,700 万~4,300 万。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了 100 万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史称“信

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是饿死人的高峰期，三年饿死 3,000 万人以上。但是，1959 年，中共却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这么多的粮食，除以 3,000 万人，每人应可得到 138.6 公斤，一个人都不会饿死。1960 年中共还出口了 270 万吨粮食。

7 文革之杀人狂潮

文革后叶剑英曾讲话说：文革整了 1 亿人，死了 2,000 万。美国夏威夷大学拉梅尔(R.J. Rummel)教授在其著作《中国血色百年》(1991 年)中估算，大约有 773 万人在文革中丧生。

《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写：“1984 年 5 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 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 万 8,000 余人非正常死亡；13 万 5,000 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 23 万 7,000 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1,200 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文革的第一波杀人潮始于 1966 年。当年 6 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宗旨下，抄家之风由北京的红卫兵掀起，迅速波及全国。随后，开始了拷打和杀戮“牛鬼蛇神”。

1966 年 8 月，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月就打死了 1,772 人。学者丁抒评说：“在中国大地上，从不会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鞭。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

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研究文革受难者历史的学者王友琴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写：“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 31 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响了全国武斗的第一枪，也揭开了第二波杀人高峰的序幕。从当年 8 月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 1968 年底方渐平息。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20 分钟后，数千名该组织成员全部被杀害。估计死于武斗的总人数约为 30 万至 50 万。

武斗中，对战俘的虐杀极为残忍。如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

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后全部枪杀。滥杀手段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活埋。

1968 至 1969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资料显示，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一个县平均约有一百人死于“清队”。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 110 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 41 人被揪斗、致死致伤。此外，还有大批有胆有识的各界人士因言获罪、惨遭枪杀或死于冤狱。

除了被残忍地杀害，文革初期有 10 万至 20 万人因为不堪迫害而自杀。如此大规模的自杀潮，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8 “六四”惨案

1989 年 6 月 4 日，中共政权血腥镇压了长达 50 多天的学生民主运动，震惊世界。至今，“六四”在中国仍是禁忌话题。有多少人死于“六四”屠杀，各界说法不一。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4 时，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并宣布“如遇阻挠，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中共军队从城郊开进北京城。

晚上 10 时后，入城的军队开始向民众开枪射击，起初，广场上的学生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后来才知，军队动了真枪实弹。学运组织者王军涛说：“你知道部队只要一开枪，就直接往前打了，一路杀过去，死伤无数。我一看马路上躺了一个人，脑子血流了一地，那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什么叫死不瞑目，眼睛看着天呢。”

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死者清单从 1999 年提出的 155 人、2005

年的 187 人、2010 年的 195 人，到 2011 年 8 月共有 202 人获得确认。

评论作家曹长青曾撰文写：“纪思道和伍浩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在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 400 到 800 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 400 人估算，也超过整个 19 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 3,000 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9 迫害法轮功

1999 年 7 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镇压，自此开始了近 18 年史无前例的人权迫害。江泽民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截止到 2017 年 2 月 17 日，经明慧网民间途径证实的，已知有 4,075 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而遭活摘器官遇害的人数更为巨大。另有数百万人被抓捕，数十万人被非法劳教、判刑。由于中共拼命掩盖真相，大部分迫害事实仍未曝光，实际死亡人数，难以确定。

虐杀发生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和精神病院等地。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杀无赦”等密令的指使下，中共对不愿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

刑，包括毒打、电刑、火刑、注射有毒药物、开水烫、烙铁烙、逼坐“老虎凳”、铁椅子、强奸、轮奸、电棍插阴道、吊刑、铐刑、枪击、强制灌食等，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死亡、伤残。许多惨烈的案例内幕辗转传至海外，曝光了中共迫害集团的罪恶。

陈湘睿(男，29 岁)，湖南省衡阳市法轮功学员。2003 年 3 月 11 日晚，时任衡阳市公安局国安支队队长雷振中带领警察将陈湘睿绑架到市公安局，警察对其大打出手，电棒、铁锤、橡胶棍一齐上阵，当场把他打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五脏六腑全部打坏，腹腔内抽出 2,500 毫升血，脑中神经致致命损坏。陈湘睿于次日早上离世。

2006 年 3 月，原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员工安妮，作为第一名证人，向海外媒体曝光中共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随后，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联邦议员大卫·乔高受邀对此进行独立调查。两人在 2006 年 7 月发布了一份含有 53 项证据的调查报告，确认了活摘指控，称此罪行乃“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十年的细致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录音和资料证据，证实：江氏犯罪集团与军队、政界、司法界、医学界、贸易界、黑社会联手，形成了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出售器官、活体实验、贩卖尸体牟取暴利。中共军队、武警医疗系统大规模涉入，达到了随意攫取、杀人如麻的地步。据分析估计，被活摘器官杀害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巨大。由于中共焚尸灭迹，受害者无一生还，更多的真相和数据还无法获悉。

10 结语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自己的国民挥舞

屠刀，而且杀人手段极其残忍，罄竹难书。从杀 AB 团、延安整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中

共不断炮制谎言，欺骗国内外民众、企图逃脱罪责。浸着鲜血的历史，无比沉重，是文明的耻辱。还原真相，清算罪恶，给明天希望。◇



共产vs纳粹

共产党与纳粹极为相似，而共产党的邪恶远超纳粹。纳粹在战争时期致死 2,500 万人，而共产主义在和平时期致死 1 亿人。纳粹的邪恶举世皆知，谁愿与之伍，世人皆会唾弃之，而共产主义仍在迷惑世人。

共产主义远比纳粹邪恶

文：程晓容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 1,700 万和 7,000 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硝烟散去。纽伦堡审判之后，许多战犯被送上绞架或入狱服刑，正义得到了伸张。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愈劫后的创伤。七十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停止。研究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陆续推出了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大批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记录黑暗的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外开放，以色列、

美国和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曝光了种族灭绝的极端恐怖。阴森的囚室、铁丝网，在时时提醒着人们：谴责罪恶，永不再犯。

今天，“纳粹”一词，早已恶名昭彰，成为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对于纳粹主义的宣扬或认可，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会令人惊悚、不被接纳。然而，就在阳光下，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还有一种罪行，更为邪恶残暴，仍然在肆虐横行，且不断变换面目。那些罪恶的制造者，那些杀人无数的暴君，居然继续被尊崇和膜拜。邪恶的理论，还在通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媒介向亿万万人灌输着。杀戮，没有停止；压制，是极权的专利。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都是对生命和尊严的亵渎，也是对昔日死难者的不敬。



▲ 共产党和纳粹的宣传海报极为相似。(资料图片)



▲ 1930 年苏共逮捕所谓“富农”的场面。(资料图片)



▲ 金边琼邑克杀戮场（万人冢）的一棵大树。柬共暴徒用这棵树将儿童活活撞死。(Getty Images)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给予了红色高棉精神和物资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实沾着柬埔寨受害民众的鲜血。而中共在屠杀本国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极，集罪恶之大成。

毛泽东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8 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 27 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 6 亿人，死一半还剩 3 亿。”

暴君酷爱斗争，令其无休止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恐怖，将全民陷于“对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血雨腥风中。时间、精力、国力，全部投入害人的斗争，而斗争又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毁灭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陈礼铭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中小结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 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专制机器不停地揪出“反党分子”，对他们侮辱折磨、剥夺一切权利，甚至大开杀戒。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肃的对象几乎都是对党和“领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热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他们沦为政治贱民，或是被劳改、抓捕，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些遭到中共疯狂迫害的受难者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艺术精英，还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滥杀，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续不断。文革期间，大陆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三大屠杀案。作家谭合专门调查了道县大屠杀，将调查报告集结成书——《血的神话》。这场屠杀始于 1967 年 8 月 13 日，主要是

针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子女。杀人手段五花八门，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等。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它是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

据学者统计，在中共执政的 68 年当中，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杀，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高达 8,000 万，仅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有 4,000 多万人饿死。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日，在“人权最好时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锁资讯、欺骗人民、迫害信仰、残害无辜。1999 年 7 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疯狂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实施了灭绝政策——“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江氏犯罪集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九评共产党》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2 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纳粹帝国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此基础上对异族实行残酷的灭绝，但是在国内，德国的民众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共产主义的更加邪恶之处在于，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例如：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波尔波特拆除了金边大教堂，而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则是无远弗届、空前绝后。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全中国城乡的文物古迹。以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革命小将”杀向各地名胜，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

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寝遭到永久性的毁灭。曲阜孔庙惨遭蹂躏，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的孔子遗骸早已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面积 3,000 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控坟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坏了。民间收藏的无数珍奇古董、古籍字画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

3 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

共产主义暴政下的产物，给邪恶轴心提供了犯罪的灵感。

陈礼铭这样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

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产主义黑皮书》写道：

“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

“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

动。请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历史的悲剧，写在昨天。严肃的思考，留给现在。警钟，早已敲响。对于一切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悲剧，对于将会实施、毁灭明天的罪恶，我们怎可坐视不理？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共产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1 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 600 万犹太人、330 万苏联战俘，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还有 110 万被放逐者死于集中营，加上战场上的 1,500 万致死人，受害者总数约为 2,500 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在 20 世纪，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总计为近 1 亿人，其中苏联 2,000 万，中国 6,500 万，越南 100 万，北朝鲜 200 万，柬埔寨 200 万，东欧 100 万，拉丁美洲 15 万，非洲 170 万，阿富汗 150 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 1 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如中国至少有 8,000 万人。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主

20 世纪遭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

苏联	2,000 万
中国	8,000 万
朝鲜	200 万
柬埔寨	200 万
非洲	170 万
阿富汗	150 万
越南	100 万
东欧	100 万
拉丁美洲	15 万
总计	1 亿 935 万

(大纪元制表)

义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飘荡，散发最邪恶的毒害。

共产主义学说故意夸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矛盾，主张阶级消灭论，宣扬暴力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为“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祖先”。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阶级和种族太过脆弱，不具备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让路，他们必将被‘革命的大屠杀所消灭’。”

1 苏共暴行

1917 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前苏联异见人士布科夫斯基 (Vladimir Bukovsky) 说：“共产党执政后，无论在俄罗斯、波兰、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国，他们首先要消灭本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会结构’。”然后，共产党便开始消灭某些特定群体，在苏联，这些人包括神父、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例如乌克兰人、车臣人、犹太人等。

列宁掌权后便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 1918 年到 1922 年 2 月，杀人不少于 200 万。列宁曾经说过：“在每个有息罪人的当中就地枪决一个。”“至少逮捕 100 名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质，把尸体挂在那里，让周围几百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并且发抖。”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了令人谈

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 800 多万人。

1930 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 170 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 1930 年至 1940 年间，由于条件极端恶劣、劳动强度过大、饥饿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 50 多万名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甚至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 2,000 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战胜美军支持的柬埔寨共和军后，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的种族灭绝共产主义革命。红色高棉首先展开了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以枪威逼，撤空了人口达 200 万的金边，年老体弱及年幼居民的尸体被弃在路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 (Pol Pot) 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 200 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开放给游客的一个杀戮场前，导游介绍说，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

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时，暴徒们倒拎着小孩的双脚，对着大树将他们的头部用力砸去，活活将其撞死。至今，还能看到有的大树上嵌着小孩的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被重棍击毙。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内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幸存者胡霍 (Huot Huorn) 对记者说：“四十年前，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鬼地。”她为 36 名死去的亲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这个政府……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们让我们挨饿、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直至他们饿死……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



退出中共

历史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共的列车正急速驶向悬崖，许多人因为留恋中共狼窟里的荣耀而忘记了危险。

到2017年2月底，超过2.6亿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宣布退出共产党、团、队。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歹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无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年1月12日

《九评共产党》目录

- 【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 【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
- 【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 【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
- 【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 【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 【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 【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
- 【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



《九评共产党》引发中国退党大潮，被誉为救世奇书。
《九评共产党》多语种免费下载：
www.epochtimes.com/gb/4/12/13/n746020.htm
或联系益群书店购买：
www.yihchyun.com.tw/z111.htm

免费“翻墙”软件

1. 链接
自由门专业版：
<https://git.io/fgp>
自由门安卓版：
<https://git.io/fgma>
2. 破网软件索取信箱
使用海外信箱寄一封信（主题不可空白）到以下邮箱：
freeget.one@gmail.com
约十分钟就可收到自由门下载点。
3. Skype
动态网的Skype帐号dongtaiwang.com提供随时更新动态网IP地址和下载自由门最新软件服务。Skype一定要到官方网站www.skype.com/zh-Hans/下载。注册后，到“联系人”点选“添加联系人”，然后在“Skype用户名”框中输入“dongtaiwang.com”，看到“动态网的Skype版”后点击“添加”，即会出现在主界面的联系人中，向他发送任意讯息，会得到有关指示。◇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

可使用真名、化名、小名三退，声明最终需要递达到大纪元退党网站。

用海外邮箱发三退声明给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破网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美国三退热线电话

001-888-892-8757
001-866-697-6570
001-702-873-1734

加拿大三退热线电话

001-604-276-2569
001-514-342-1023
001-416-361-9895

三退传真

001-301-916-2364
001-201-625-6301
001-510-372-0176

【大纪元编辑部特稿】

感情代替不了理智

1921年，西来的“共产主义幽灵”侵入中国，一群躁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共产党，从此引狼入室。共产党在中国历次运动中杀戮文化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毁灭中国的文

物和历史，批判中华民族的祖先、圣贤、英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五千年文明被践踏得一钱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党文化。

现在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文化中

长大，很多人是非善恶完全被混淆，以在邪恶的环境中求得一时风光、一点甜头为荣耀，作为人一生中值得留恋的东西，以至于用感情取代理智，忘却了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

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历史时期和自由社会正常人生中的真正荣耀。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切莫用感情留恋狼窟里的荣耀，去除中共恶棍才是我们的责任。

1 历次运动都杀戮文化精英



▲文革中拉萨大昭寺被破坏之后，贵金属被收集起来运出西藏。（资料图片）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所秉持的传统价值观、独立思考性和社会影响力，被中共视为最大的障碍和威胁。所以中共历次运动都整肃知识分子、杀戮文化精英。

20世纪30年代，中共内部发动肃清“AB团”运动，在全国各苏区杀戮子虚乌有的反共“AB团”成员，至少7万多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这是中共首次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肉体上消灭”。

20世纪40年代，中共发动持续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党员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思想改造，要将人性改造为党性，并进一步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控制。著名的案例是对作家王实味的批斗，王因不愿改变立场，最终被杀。延安整风运动发展出一整套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办法。

1949年中共建政后，知识分子由“叛徒、内奸、特务”的怀疑对象，转变为中共眼中最大的“思想污染源”、异见者和政权颠覆者。这时候，中共掌控国家和社会资源，接管一切教育和文化机构，垄断知识分子的衣食来源，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与无限效忠。为把知识分子改造为党的“驯服工具”，中共对他们的控制、凌辱和杀戮超过任何阶层。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

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查对中共的官方资料，反右运动中，中国一半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底层贱民，遭受迫害。

文革中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更是触目惊心。因不堪凌辱、酷刑、恐惧而自杀的文化名人不胜枚举。著名作家老舍跳北京太平湖自杀；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其妻子随

之上吊；国学家熊十力绝食身亡；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服安眠药死于医院；著名女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跳楼身亡；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与妻子服安眠药自杀；《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服毒而死……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既是对中国文化精英的肉体摧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破坏，更是对国民精神的摧残、对伦理道德的颠倒。知识分子被打折了脊梁，大多数人沉默了，跪下



▲2000年被中共暴力殴打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北京工商大学青年女教师赵昕。（明慧网）

了，沉沦了，民族精神枯萎了。

随着时代发展，中共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但整肃和杀戮文化精英的手段没有变。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开动坦克和机枪镇压学运。据不完全统计，镇压导致3,000人死亡，大批知识分子流亡海外。

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被迫害和被枪杀而死亡的人数或在8,000万以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这样残杀同胞。

2 辉煌文明被践踏得一钱不值



▲1966年11月，红卫兵砸毁山东曲阜孔庙，纵火焚烧匾额。（资料图片）

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如果文化不存在了，这个民族也就成了无源之水，离消亡不远了。文化传承延续了华夏血脉，文化革新影响着王朝更迭，文化认同凝聚着民族精神。而中共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文化，欲以党文化取代之，尤以“文化大革命”最为疯狂。

文革毁灭中国的文物和历史。全国上下约有1,000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古玩不知有多少被焚毁。寺院、宫观、佛像和名胜古迹等都成为破坏对象。中国城市乡村千百年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迹和遗产被破坏殆尽。

代表中华文化的儒释道圣贤、民族英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文革中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们的塑像、庙宇被毁，有的还被掘墓辱尸！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但黄帝陵遭到永久性的毁灭。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儒家始祖孔子被中共肆意批判和侮辱，坟墓被铲平、挖掘，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3 狼窟里的荣耀不值得留恋

共产主义引入中国后，曾经以民族“救亡图存”和建立“人间天堂”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很多人一生都生长在党文化的环境下，取得了一些财富、地位和成就，让他们感到自豪与留恋。

但是，仔细审视这一切，这种荣耀值得留恋吗？今天的中国，环境恶化，道德沦丧，诚信缺失，为人师表者强奸幼女，为人学者弑杀恩师，老人跌倒无人敢搀扶，官员贪污腐败，拥有二奶、三奶、四奶……身在其中犹如身在狼窟，与中国过去路不拾遗、民风淳朴的盛世天朝有天壤之别。

中共1949年建政，它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谎言，让受蒙蔽的中国人自我感觉不错。有人以“打江山”为荣，有人因为手中的权位不可自拔，有人表面上不承认与中共为伍，潜意识中却留恋中共所给的好处。可是，一旦中共倒台，回过头来看，其中的一切都不值得怀念，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

中共计划经济崩溃之后开始搞“改革开放”，在中国融入世界后，经济开始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事。假如不是中共，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执政，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加上中国的资源，中国经济会比现在发展快得多、好得多。没有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八千万非正常死亡，老百姓会安居乐业，会富裕得多。

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屈原的“上下求索”、岳飞的“精忠报国”、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在自由社会里，也有那些为自由人权价值而努力的仁人志士，受人尊敬。对比戈培尔、希姆莱、雅戈达、叶若夫等的下场，今天有谁会以在纳粹中的地位 and 名望而自豪？有谁会以独裁者斯大林给的荣誉而自豪？

在中共邪恶的环境中求得一时

风光、一点甜头，作为荣耀、作为人一生中值得留恋的东西，这和真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各个时期相比、与自由社会正常理念相比，一个是狼窟里得到的一点荣耀，一个是真正人生中的得到的荣耀，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要留恋狼窟里得到的荣耀！那是这一代中国人的耻辱，是在引狼入室、与狼共舞，甚至是助纣为虐。

中国历代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记载着中华文明的荣辱兴衰，像明镜一样照着历朝历代的善恶美丑，大善大奸均难遁其形。等中共灭亡之时，翻开那段历史所记载的红朝，狼窟里的荣耀将成为罪恶的见证。

再看看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倒塌的列宁像见证着它的邪恶，《共产主义黑皮书》记载着它的耻辱，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诉说着它的苦难，狼窟里的荣耀可能是千古骂名！

4 中华儿女的责任：去除中共恶棍

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母亲，那么中共就是欺凌我们母亲的恶棍。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去除这个恶棍才是理智的抉择，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没有中共，中国会真正繁荣富强，自由昌盛。在历史上，没有中共的中国，历朝都曾是世界强国。

黑暗终将离去，巨变正在发生。中共的灭亡就像冲向悬崖的列车，无可避免。令人忧心的是其中无数个体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未来。用理智代替感情，冷静地思考中国种种危机的体制根源，清醒地看到中共的危害，赶快跳下“死亡列车”吧。如何跳车？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就是最好的办法，真心动这一念，化名也有效。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抛弃共产党，恢复中华民族的荣耀，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